

哲学与文化新论

刘 勇 高秀昌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哲学与文化新论

刘勇 高秀昌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与文化新论/刘勇,高秀昌主编.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2
ISBN 978-7-5348-2690-0

I. 哲… II. ①刘…②高… III. 文化哲学—理论研究—文集 IV. G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2010 号

责任编辑:卢欣欣 卢海山

责任校对:王红蕊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mm × 1000mm 1/16

印张:18

字数:240 千字

版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48-2690-0 **定价:**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李景源	001
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启示	李德顺	00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原则与方法	郝立忠	0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尊重传统文化继承性	潘叔明	023
寻找哲学的新起点	杜丽燕	032
对“客观存在”的重构	胡 玻	044
丹尼尔·贝尔后现代文化理论思想探析	宋艳琴	052
论传统的变迁与消亡	王伟凯	058
文化对诠释心理的价值意义	王 妮	064
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贡献	高秀昌	071
哲学是文化价值结构的核心		
——现代新儒家关于哲学与文化关系问题的根本理念	余秉颐	079
从古代哲学思想延续看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特点	牟 岱	087
多时态文化共存条件下人的文化心态	刘伟民	097
关于太极图模型文化内涵的一种断想	万 里	105
角色:儒家宗法主义的逻辑起点	安继民	115
当代社会处境下的佛教观念及其信仰:一种基于“人间佛教”		
思想的阐释	陈永革	131

中国前现代时期的两次意识形态建设及其当代启示	代 云	142
“和”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张文彪	154
简析唯物史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创新	陈东冬	167
传统哲学中“和”思维的特性及其当代启示	孙 丽	175
对和谐文化建设的哲学思考	黄小军	182
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文化基础	谢增虎	189
休闲的社会和谐价值初探	王景全	195
论人格本位观的“诚信”基础及其教育途径	赖功欧	209
荣辱观教育对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意义	庞丽峰	222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伦理问题	李培志	228
论中原文化与河南当代伦理道德建设	周全德	236
构建和谐中原的道德建设向度	齐建英	250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刘 勇	258
可持续发展观的人文审视	胡发贵	267
理念创新对当代文化产业化的驱动作用	魏晓琳	270
“哲学与文化”理论研讨会暨全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所长工作会议纪要	代 云	278
后记	刘 勇	282

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李景源

一、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观的变革。历史决定理论的命运,历史观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变动和将要亡国灭种的残酷现实,救亡图存和追求现代化的客观需求成为哲学观念变革的深层历史根据。中国社会出现了从“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思潮”转向了“社会改造论”的思潮。“社会改造”成为取代“伦理革命”、“文学革命”的纲领性口号。各种进步社团、进步报刊,纷纷举起社会改造的旗帜。陈独秀表示:“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须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支持的“少年中国学会”,把注重社会改造作为共同的社会目标。要改朝换代,要改造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发展道路的问题。随着改造社会现实呼声的出现,历史观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和主题。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当时的志士仁人挥之不去的大问题。梁启超率先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针对当时一些人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层,对历史动力的寻求停留在观念、精神和宗教层面,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就站出来反抗那些历史家和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被历史学家蔑视的,对于研究社会生活有莫大的价值。”包括早

期的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对唯物史观情有独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唯物史观中看到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向和途径。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吸收东西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民族形式和传统内在生成的过程,是几代人艰辛探索的结晶。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李大钊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毛泽东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二、唯物史观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从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来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实质是历史观的转变,从这里可以得到启示,即历史观问题是世界观的核心部分。毛泽东讲,他在1902年到1908年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信奉的就是修齐治平,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圣贤救世的理想追求。过去把“内圣外王”之道看作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和人格理想,今天我们应把它上升到历史观层面来认识,“内圣外王”实际上是传统社会占主导形态的历史观,它成为帝王中心、王朝体系、正统观念、英雄史观的核心理念。毛泽东在寻求历史主体的问题上,从崇拜英雄豪杰到坚信人民大众,是革命实践活动和当时社会的政治腐败教育了他。辛亥革命后,毛泽东认识到,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绑在所谓英雄和大佬的身上,中国是没有希望的。1918年,毛泽东发起并领导的震动全国的“驱张”运动失败后,使他认识到“一张敬尧走,百张敬尧来”,单靠请愿和呼声革命是根本不行的。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毛泽

东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动力。所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号召民众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后来跟斯诺讲,是客观环境逼迫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论,从此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后一篇文章是《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唯物史观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是民族文化心理演变的缩影,代表了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转折。事实证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有赖于历史主体的觉醒,当一个阶级认识其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当人民群众自我觉醒成为历史主体时,现在的社会制度的解体就开始了。

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最大贡献是在群众史观方面,毛泽东的群众史观包含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崇拜巨夫伟人到相信人民大众,这点刚才已经讲过;第二个环节,是从平面地、抽象地理解人民大众到具体地、立体地理解人民大众。1956年,他在同外国一个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因为那时是“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表示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已经由社会结构的上层转向下层。这一点对于改造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唯物史观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即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能否把这两个观点统一起来,是划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民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历史性活动是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相互作用及其解决的主体因素。毛泽东以新的历史观为原点,设计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使群众史观具体化为一整套民主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把群众史观与政治斗争结为一体,以唯物史观为体,以路线、方针、政策为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三、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史观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讲过,他们并不精通经济,那么他们如何建国,如何治国?就是靠哲学理念。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在理论与历史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他曾经说过,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他始终坚持以中国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为自己思考的主题,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所面对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他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史观。生产力的观点和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它们是内在统一的。两者的一致性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名言上: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和而不同。

通常总是说,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带领全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两方面的拨乱反正,其实质是历史观上的拨乱反正。就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而言,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都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历史观的问题。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时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两个凡是”涉及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引发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目的就是进一步从历史观上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天才论”,批判圣贤史观,用实践标准代替语录标准。唯物史观不仅是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哲学依据,也是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理论依据。要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就必须进行艰苦的理论工作。为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用极大的精力关心理论工作,在恢复和发展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明确提出两个发展动力问题,即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问题。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根本任务,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

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动力?”

第二,进一步批判“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恢复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对“政治”概念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明确提出在经济建设时期,经济就是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提出了三种革命的理论。针对“四人帮”把阶级斗争理论推向极端,宣称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点,1980年年初,邓小平专门论述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此后,他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的三种革命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它们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是邓小平主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基本理念,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四,邓小平以生产力史观为核心,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给予了科学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74年,毛泽东提出,要让一部分学者研究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不起来?这是最初意识到社会主义出现了问题。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各国代表团时说,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越搞越穷?第三次,邓小平同志和捷克的同志说,中国停滞了,这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思考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不管怎么搞,不管采取什么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把它作为党的宗旨和执政兴国的总体理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统一起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坚持”:即“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利益奋斗的一致

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保证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国内外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明确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上来。我们党针对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提法之后,进一步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马克思那里的“社会”或“社会形态”概念在内涵上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体性概念,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社会建设”是有别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狭义领域,特指社会事业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政府的管理观念的一次升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列宁曾经讲过,每个国家总要根据本国实践的实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问题摆到首位。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内在要求它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每一次成功的结合都实现了理论的重要突破,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成果是成功结合的结晶。三大理论成果最富于创造性的部分,就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它变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旋律。从毛泽东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并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代同步的重大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三个还原,即还原历史,还原问题,还原我们党解决中国命运和发展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从中学到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

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启示

李德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到所有的领域和层次,问题很多。而目前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方法问题更重要。在此,我着重阐发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问题。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越来越多,怎么应对?这是党的干部、党的建设当中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下面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当中包含的哲学智慧这个角度,来谈谈个人研究的体会。

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是思想内容与实际结合得非常紧密,而理论表述形式却似乎不那么典型。所以有人怀疑邓小平理论是否有理论体系,是否有哲学理论?哲学来自实践。马克思认为:人们看不见的思想精华都蕴涵在哲学中。从哲学上看邓小平理论,其中的哲学思想很丰富,并且很新颖、很前沿。邓小平总是将哲学融入实践,但他很少直接用哲学的方式、哲学的话语、哲学的模式、哲学的文章来讲哲学。所以要读懂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就需要有一定的哲学准备。

关于邓小平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在第一代领导人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按辩证法办事。注重辩证法,用辩证法解决问题,是邓小平坚持的思维方式。但邓小平理论的辩证法与传统的辩证法有区别。这里涉及到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就是辩证法的“两种形态”问题。

一、区分辨证法的两种形态

辩证法有两种形态的思想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指出,辩证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辩证法的神秘形态,一种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法。

之所以强调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辩证法在我国的影响有关。过去极“左”的时期,中国老百姓有句话说:“不怕共产党讲唯物论,就怕共产党讲辩证法。”因为共产党讲唯物论的时候,就讲生产生活、讲发展,这是正确的;而一到讲辩证法的时候,就要犯错误了,辩证法成了诡辩法、变戏法。例如开始时讲“三大规律”,后来归结为一个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然后把一个规律又简化为半个规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这就把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了。从理论上看,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化为“一分为二”是不妥的。因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本意并不是“分”,而是说,事物“分”为几个方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两个方面之间只要发生关系,就都是既对立又统一、既排斥又吸引、既斗争又统一的关系。而“一分为二”只强调了“分”,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普遍的公式。用它来看待问题、观察事物,结果就出现两极对立化的思维,助长了“以斗争为纲”的僵化思维和简单化作风。例如不断地讲“敌情”,以为只要认识了敌情,就有了正确的答案;没有敌情的时候,也要“树立对立面”,等等。这种思想方法的影响到现在还存在,例如近些年总有人写文章讲“一分为三”,主张要把“一分为二”变成“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多”,说这才是普遍规律。其实这种主张仍然是“分”的直线思维的后遗症,不过是换了方向而已,在哲学上并无深刻意义。

过去我们搞的辩证法,很多并不是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而是马克思

批判过的黑格尔神秘形态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君主制度作辩护的,所以得到当局的肯定。马克思要讲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简单说就是实践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实践的辩证法,是指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批判的辩证法,就是不满足于现状的辩证法,是有自己理想追求的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即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玩弄概念的辩证法,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立足社会实践的辩证法。

二、辩证思维的本质是实事求是

我们为什么要讲辩证法?为什么要按辩证法办事?不是为了给自己随意辩护。合理的辩证法,归根到底是为了达到实事求是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如果辩证法不是为了达到实事求是,就有可能被讲歪,讲成纣王那样的诡辩法。《封神演义》中说纣王“知足饰非,辩足拒谏”。就是说他的知识刚好够他文过饰非,他的口才刚好够他拒绝批评建议。这种描述很能刻画神秘形态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则是要我们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首先从根本上恢复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中国历史上就有实事求是之说,毛泽东将之作为“抗大”校训。我们经常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我不主张像“开列真理清单”那样列出几条“基本原理”。但马克思主义有最根本的原则,却是非常简单明确的,就是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这是真理原则;另一条是一切为了人民,这是价值原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坚持真理原则,表现为实事求是;坚持价值原则,表现为一切为了人民。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两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为了人民。我们的一切对与错都应该用这两条来衡量。我们按马克思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很多新情况,很多新问题,过去有很多做对了的要坚持,做错了的要改进。如何坚持?如何改进?就是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

例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因为我们中国也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进行的革命。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分成两部分: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我们虽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但我们曾经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取得资本

主义的成果,又要超越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只能叫“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严格地说我们现在是不够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还没有达到。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埋头苦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国的国情,将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水分挤掉。而过去有些想法和做法,例如认为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都不能做,我们只能做资本主义之后的事。这种老是要跟资本主义“对着干”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历史阶段,就不是实事求是。

这几年我在讲学时经常有人问起:“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吗?”我知道,他这样问,自己内心里多半是否定的。而我回答则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如果你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苏联或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个样子,那么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但我要问:社会主义为什么非得是那个样子,而不是现在和将来这个样子呢?有谁这样说过?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样讲,有人又不明白了:资本主义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呀,有什么不同?我说,理解邓小平理论要有历史的眼光,要看清楚是在什么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封建主义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实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

另外,动不动就问“有什么不同”的提问方式,本身也是两极对立思维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是旧的、神秘形态的辩证法作下的毛病。“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发明了一个整人的罪名,叫“相似罪”,动不动就以“何其相似乃尔”为理由,不分青红皂白,给人扣帽子、打棍子。而我们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地做事,就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该怎样就怎样,既不要怕“像谁”,也不要怕“不像谁”。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需要勇气的。邓小平讲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做,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不是按照固定的模式套出来的。怎么才能搞好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概括得简单明确;最可贵的是找到了客观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三个有利

于”标准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以一个动态的要求、一个动态的逻辑,提示了实事求是的本质。这是高水平的辩证法,是大手笔。

我们过去理解社会主义总是很机械,以为像盖大楼一样:先设计好图纸,再来施工建设。过去老是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就是像对照图纸来检验工程一样。这种“蓝图”式的思维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历史过程虽然有人的参与,但它并不是一个人人为的过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先有了固定蓝图,然后按照蓝图施工建造出来的,而是像生命的成长一样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生命的成长不可能是这样:父母先画个图,然后让孩子按这个图纸生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个不断地探索、开拓、创造的过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就与马克思的看法很一致。邓小平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两个问题。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问题是我们如何建设实现它,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世界上叫社会主义的国家有很多,是不是一叫社会主义就必然胜利了?不是的!只有搞好了,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胜利。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也不是自发的、单一的必然性,而是取决于我们干得怎样。这就是邓小平辩证思维的过人之处。

三、辩证思维的目的是为了人民

讲辩证法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价值、造福于民。我们讲辩证法要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这个追求不是为了个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辩证法不光讲客观规律、讲事实。掌握了客观规律还有个价值导向问题,即用它来做什么?马克思主义合理辩证法的导向是:为了人的解放,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谋求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导向,这已作为党的宗旨确立下来。“宗旨”就是最高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

贯彻价值原则,把价值导向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这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过去我们只讲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必然,讲得理直气壮,却忽视了人

民的选择,忽视了人民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他更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得怎么样,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按过去的理解,社会主义既然是历史必然,那么就可以不管人民的疾苦,不管对人民有没有好处都得干。“四人帮”时期走到了极端,于是就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红旗上天、卫星落地”这样的话语。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理解。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时,是实事求是的;而在构造未来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人道主义”等原则出发,认为未来应该怎么美好,他们就怎样设计,总之是基本上靠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分析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指出:这种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了产生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条件,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即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与人民的利益一致,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选择。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必然性与人民群众的选择性、历史真理与人民价值相统一的过程。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常常将社会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分离开来,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主活动分离开来。在苏联中后期,出现了以真理观掩盖价值观的倾向,漠视或忽视人民群众选择历史的作用,把大多数群众看做革命改造的对象,而不是看做社会主义政策、决策的基础、根据和主体。而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把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拨乱反正。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经过几十年,从苏联搞社会主义到我们搞改革开放,通过这些实践,邓小平得出了这个结论。它表明,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要与其价值观结合起来。社会主义与人民大众是联系在一起的。胡锦涛同志说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至于怎么落实,怎么体现,当然还有许多的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和处理。